

● 高端访谈

编者按：John S. Levin 博士系加拿大人，早年就学于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1989 年获教育学博士学位。毕业后曾执教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后到美国，曾任亚利桑那大学、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教授，后任加州大学河滨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Riverside)教育研究院院长，此间曾兼任加州社区学院协作项目(California Community College Collaborative)主任。现任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教育研究院教授。Levin 教授长期从事高校教师学术身份、社区学院等领域的研究，其主要著作有 *Understanding Community College*、*Community Colleges and New Universities under Neoliberal Pressure: Organizational Change and Stability* 等。他近年集中研究新自由主义与学术职业的关系、大学教师学术身份等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揭示了学术身份在美国三个类型的高等教育机构中呈现出的混合状态，阐释了美国高校教师采用不同应对策略以维持自己学术身份的内在机理，在美国高等教育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本刊特邀加州大学河滨分校访学博士生刘隽颖同学就这个问题对 Levin 教授作了专题学术访问。

新自由主义背景下美国高校终身制教师 学术身份的冲突与适应

——John S. Levin 教授专访

John S. Levin¹ 刘隽颖^{2*}

(1. 加州大学河滨分校 教育研究院, 美国 加州里弗塞德 92521; 2. 厦门大学 教育研究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新自由主义不仅影响了不同类型高等教育机构的组织和实践，也挑战了传统的教师学术身份。在此背景下，美国高校中的终身制教师通过不同方式寻求其学术职业身份的合理化：他们选择在各种规范中适应、顺从、怀旧或“类似怀旧”、伪装、牺牲，或抵制。借此，终身制教师通过优先考虑学术逻辑、削弱新自由主义力量的方式来维持着自身的学术身份。

关键词：学术身份；终身制教师；新自由主义；美国高等教育

作者简介：John S. Levin(1944—)，男，加拿大温哥华人，博士，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教育研究院教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政策与管理、大学教师学术身份、社区学院研究；刘隽颖(1989—)，女，江苏宿迁人，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生，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访学博士生，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基本理论、大学教学改革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得到国家留学基金(留基发[2017]3109号)资助。

中图分类号：G6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068(2018)03-0101-09 **收稿日期：**2018-06-17

DOI: 10.19563/j.cnki.sdj.2018.03.011

* 通讯作者：刘隽颖，E-mail：jennyljy0428@hotmail.com。

在新自由主义背景下,美国高等教育日益成为竞争激烈的自由市场,生源、经费、师资,乃至排名、声誉都成为各类高校争夺的主要目标。这一现象对高校教师的学术工作及其学术身份产生了直接影响。加州大学河滨分校 John S. Levin 教授近些年来就此问题,采用质性研究方法,着眼教师个人叙事,在不同类型的美国高校中开展了专门研究。笔者(以下简称“刘”)受《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之邀,有幸对 Levin 教授进行了专访。

刘: Levin 教授,非常荣幸有此机会与您共同探讨您最近关于大学教师学术身份的研究。当下学术职业日益分化,我们非常有必要关注大学教师对自身的工作和角色是如何解读的。我注意到,您在研究中特别强调了新自由主义对美国高等教育带来的影响,首先是否可以请您谈谈对新自由主义的理解?

Levin: 我也很乐意与中国读者们分享我的研究。新自由主义不仅在美国高等教育系统中留下了烙印,同样影响了全球高等教育市场,包括中国。在这种背景下,对于大学教师学术身份的研究使得我们可以审视大学教师在其角色中的冲突与需求,反思这个充满争议的时代下高等教育和学术职业自身的逻辑。

对于新自由主义基本上有三种不同的解释:一些学者将新自由主义视为一种意识形态;一些学者视它为社会经济理论;还有一些学者将它作为一种形式的“治理术”。第一,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是建立在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和个人权利的准则上,并伴有以下行为:个体层面上追逐个人利益;国家层面上实践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这里新自由主义背后的假设是:遵循利己主义的个体是理性个体,为满足个人需求和利益作出最佳选择。因此对于政府而言,自由市场是在社会体系中“分配资源和机会的最佳方式”^[1]。第二,在将新自由主义视为社会经济理论的阐述中,核心概念包括自由市场、竞争加剧、个人自由和选择、有限的政府干预,以提升人类福利为宗旨。^[2]第三,作为一种“治理术”的新自由主义关涉的是政府行为,目标是“更少地使用力量和权威来获取更大的成就”,通过授权给自我管理的个人以获取经济竞争优势和国家繁荣。^{[3]1-51}在我的研究中,新自由主义被视为社会经济理论,作为分析数据的理论视角。

刘: 具体来说,新自由主义在高等教育系统中是如何表现的?

Levin: 在高等教育研究中,对新自由主义的阐释经常与“学术资本主义”相等同。Slaughter 与 Leslie 指出“新自由主义将高等教育视为一种市场实体”^{[4]1097},但 Slaughter 与 Leslie 频繁使用的是“全球化”一词,而非“新自由主义”。Walker 在对 Slaughter 和 Leslie 工作的延伸中,通过对高等教育全球化的历史审视,指出学术资本主义描述的是“高等教育在新自由主义影响下发生的种种变化”,她认为全球化是学术资本主义的诱因,作为学术资本的大学都在全球化的进程之中。^[5]虽然 Gonzales 等人将学术资本主义视为新自由主义的延伸或传输工具^[6],但 Walker 认为,作为解释行为的视角或理论工具,新自由主义与全球化和学术资本主义是同义词。^[5]

学术资本主义认为,大学教师(也许还包括其他作为支持角色的利益相关者,如行政管理人员、政府官员以及政策制定者们)是高等教育市场化和商品化的责任主体,但并不意味着对于所有教师 and 所有院校情况都是如此。学术资本主义始终是新自由主义的一个部分,然而它特别与一群研究成果在经济市场上需求量颇高的研究型大学教师休戚相关。与其他追求金钱或逐利的学术行为相比,新自由主义带来的影响是更为复杂,也更为微妙的。

新自由主义最主要的原则是自由市场和个体自由。自由市场通过引入竞争作为一种构建机制,以高效公平地分配资源和地位。高等教育机构以及其他的工商业组织,都参与到市场竞争之中。高校需要为实现教育目标而筹资,因此它们为资源而竞争,为学生、教师、资金流而竞争。

刘: 如您所说,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高等教育已经成为一个竞争激烈、资源驱动的市场。我们已经见证了诸如大学排名压力、研究导向以及各种形式的“学术漂移”现象。基于您长时间的观察,美国不同类型的高等教育机构分别发生了什么变化?

Levin: 美国高等教育确实高度分化,反映着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或者外部力量导致各个类型的高等教育机构——研究型大学、综合性大学、社区学院——都在发生着组织结构的变化。

为了在竞争中取得成功,高校采取多种多样的策略,追求产品差异化就是其一。生产具有差

异性的产品使得生产者具备竞争优势，高校在高等教育市场中同样力争自己的服务和产品与竞争对手相区别。因此，对于研究型大学的领导和教师而言，优先考虑的是科研生产。科研产出的数量和教师、院校声誉之间有一种相关性。反过来，院校声誉又与财富、吸引捐赠和资源的能力、招生中的优先选择权紧密相关。

与此同时，处于这个具有等级性的高等教育市场底部的高等院校面临着另一种形式的竞争。他们需要争取学生和资源以确保自己在市场中存活。由于产品的同质性，即以教学为主要产品，这类高校（主要是综合性大学和社区学院）不以研究为主要导向，而是针对特定族群，在资源允许的条件下为他们提供不同的服务。缺少竞争优势迫使这类处于低端市场的院校能够更快、更为创新地回应市场变化。但同时，对于缺乏资源的院校而言，这也是一个挑战。如 Giroux 所说，新自由主义导致“富有者独得大量补助”，而贫困者为生存挣扎。^[7]

在面对市场压力的时候，不同类型的院校会采用不同的策略。以教学活动为例，由于市场鼓励减少成本的同时提升产量，因此研究型大学为满足日益增长的在校生的需求，选择采用大规模的讲座课程、聘用教学助理和讲座教师（兼职）。所以研究型高校的全职教师可以维持一个适度的教学量（譬如一个学年四门课程），而不需要牺牲科研时间。相比之下，社区学院扩大了班容量，也增加了教师的课时量。同时，综合性大学、州立大学和社区学院都聘任了众多兼职教师来指导越来越多的学生。这种雇佣大量廉价劳动力的方法，使得这些高校能够提升，起码是维持生产力。其他在教学方面的生产形式还包括使用现代信息技术，尤其是远距离和在线教学，以相同或更少的成本来应对更多的学生。^[8]

在这些现象的背后是作为学术职业基石的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的减少。新自由主义挑战了传统学术职业的概念，尤其是迫使教师工作直接面向经济市场。在高等教育组织中，教师需要自由和自治来从事教学、科研以及其他学术活动。但是市场力量迫使高校适应变幻的经济趋势，研究型大学要求教师获得科研基金，其他院校要求教师从事更多的教学和服务工作。在这种市场背景下，新自由主义的理念深深地影响着高校的实践。可以说，高校受制于经济市场的压力，甚至被其

改变。

刘：感谢您对这些组织变化的解释。下面，我想将我们的讨论转向教师层面。是否有迹象表明在这三种类型的高校中，新自由主义对教师的工作直接产生了影响？如果有，具体又是如何表现的？

Levin：我们对加利福尼亚州三种类型公立高校，即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UC）、加州州立大学（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CSU）、加州社区学院（California Community College, CCC）的教师学术工作做了一个研究。我们的结论是新自由主义对他们的学术工作、自我认知都产生了影响。

访谈的结果揭示了以下现象。对于 CSU 和 UC 而言，虽然教师感受到了个体的自由或自治，但仍受制于科研上的管理压力。一名 CSU 的生物教师宣称：“教师们面临越来越多的压力去获取科研经费，为学校带来资金。”一名 UC 的生物教师同样表达了这方面的压力：“我喜欢我的事业，但我希望研究经费不要成为一件令人担忧的事。”尽管她有能力和经费支持自己的研究，但她仍持续受此困扰。CCC 的教师们并没有科研产出方面的压力。访谈显示 CCC 的教师与综合性大学的教师相比，拥有更多的时间和福利。一名 CCC 的生物教师认为他的职业是“一个很棒的职业”，有着“非常好的福利”。当三种类型高校的教师从个人选择和偏好的角度谈论他们的职业时，他们也追随着一些新自由主义的原则，譬如经费的竞争、个人收益和回报、个体的自由，这些原则虽然不是他们积极提倡的，但确实是在他们身上上演着。在这些教师的叙述中，缺失的是建立在公共及社会福利基础上的大学教师工作要义，以及科研、教学、服务背后的学术本原。

对于加州而言，高等教育在 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期就已然成为自由市场。原因之一是该时期“或多或少的社会机构——包括大学、医院、慈善机构以及政府——都被要求有义务像商业公司一样来行动”^[9]¹⁶⁷。大学教师在坚守组织目标的同时，也回应着各种激励措施和行为准则，使得自身更具竞争性、突出特性并维护着个体自治，这其中也包括个人回报。

另外，三种类型高校的教师们很节制地宣扬新自由主义的一些优点，他们拥护新自由主义的价值，尤其是在市场和市场竞争中能够获得特权。

教师们强调自己的特殊性,尤其是CSU和UC的教师们,他们参与竞争并且他们的科研产品在本地、国内甚至国际市场上都被重视。他们认为自己获得的最主要的回报就是个体的自治——基本上能够独立安排自己的工作。他们指出,通过一个或更多的研究基金和创收、教学卓越和对学校服务的付出,他们完成了自己的产出,为各自学校带来了认可。这种认识一部分反映了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某种程度上新自由主义政策在经济意义上和象征意义上都为教师带来了回报。教师的行为还取决于他们个人价值观之外的一些源头,比如高校,当地、国内、国际市场,代理机构(政府、认定机构),以及那些同样需要依靠高校来实现自身目标的工商业伙伴。

刘:我注意到您在对教师学术工作的关注之后,将自己的研究集中在了教师的学术身份问题上。学术身份暗藏在了教师行为的背后,同时也隐含在教师的自我叙述之中。您是如何定义教师的学术身份的?在高等教育机构中教师的学术身份又是如何被塑造的?

Levin:根据身份认同理论(identity theory)的研究,传统的身份塑造是个体内在逻辑和社会环境的结合。在工作场域,身份的形成包含着一系列的策略和机制,通过这些策略和机制,个体发展了对于自身作为职业或专业组织成员的一种自我理解和自我定义。一种职业或者专业身份的构建是一个不稳定的、充满协商的过程,个体可以对自身的角色功能发展出多重认知,以回应工作场域的挑战和需求;同时,职业工作所在的组织背景也为个体提供了文化和社会资源,使得他们理解自己和自己的工作。

学术身份指的是大学教师理解和概念化自身在高校中所处角色以及与高校关系的方式。对学术身份的表达,将个体经验和对高校的期待(包括它的结构、规范和实践)结合在了一起。^[10]社会组织对个体职位的期待构成了他们的角色需求,而对这些期待的内化不仅塑造了行为,也塑造了身份认同。举例而言,各种委员会工作和服务工作同教学、科研一道,都构成了教师的角色需求,即大学需要终身制教师承担这些责任和义务。其他方面的需求都影响、触动着大学学术身份。

由于对学术成就及其认定有新的标准,学术职业的定义也在经历着变化。尽管对于学术身份没有一个单一的概念,但学术事业还是有诸多核

心特征:对知识的追求和传播、学术自由、专业自治、同行审核和评议、自我管理和同行管理。学术身份建立在一个群体的实践之上,以学科、自治、自我管理、同行责任等形式存在。实际上,学科和组织类型塑造并分化着学术身份。

刘:不同于兼职教师和非终身制教师,终身制教师似乎拥有一个稳定的职位,他们的学术身份最大程度上与高等教育的逻辑、高等院校的理念保持着一致。根据您的研究,目前终身制教师面临着怎样的身份危机?

Levin:新自由主义去中心化的结果使得高校变成高度竞争和市场化的机构。但与此同时,大学内部关于学术本身的一些核心价值观和信仰,依旧充当着学术身份的“镇定剂”。对于终身制教师而言,他们在现阶段面临着两类主要的期待:其一,在知识领域内的专业性、忠于学科或领域的实践、忠于职业道德和忠于教学科研服务等义务;其二,这些教师同样面对,也被迫遵守高校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和指令,要求他们参与到被监控、被监督的环境之中。这些政策和指令常常与他们自身的角色期待相冲突。这些冲突潜在地造成了高校教师对他们学术身份的不安全感、不稳定感。身份认同理论将之称为对身份标准的“去确认化”(non-verification)^[11]¹⁸⁷,可能导致身份的转变。有一些学者进一步指出,学术工作不再是一种令人满意的对智慧和创造性的追求了。但是,终身制教师仍坚守着他们的学术身份,声称重视自己在高校中的职业工作。“学术生活中,我们大多数人在某种程度上是被那些源于学术活动而产生的内在满足感所驱动。”^[12]⁶⁵⁻⁷⁸这并不是说所有的终身制教师都维持着他们的学术身份。为了满足或者迎合那些负面的需求,一些人确实改变了他们的身份。这些教师可能假定他们的角色是企业家,不仅为高校,也为个人创收。他们也会尝试诸如系主任或副院长这类的管理角色。他们也许会长久地转移到行政职位上,放弃他们主要的教师角色和身份。

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终身制教师具体是如何来维持自己的学术身份的呢?

Levin:在这样一个不得不服从于新自由主义对学术产出进行量化的背景下,终身制教师有他们各自不同的方式来应对自己的学术身份危机。我想根据我们的访谈结果,举一些例子来说明这些具体的应对方式。^[13]

1. 适应规则

教师调整自己来适应各种新自由主义下的期望：他们开始习惯于“不断的工作、自我牺牲、自我规训”^[6]。对于新教师而言，他们不得不适应大学的这些期望，因为想获得终身教职和荣誉，就要遵守组织的一系列价值取向：科研高产，良好公民，能为学校创收。虽然传统的学术身份是建立在学术部落、共治、独立和自治这些概念之上，但新形式的学术身份是混合多元的，既包含着传统价值，也包含着新自由主义的取向。这种混合，与消费主义和经济市场相联系，同时也逐渐脱离了学科，甚至传统的研究。传统学术观和学术资本主义就这样同时深埋在当前大学教师的学术身份之中。通过将这两种取向同时融入自己的学术身份，终身制教师也适应了这两类对立的需求：一是来自市场；一是来自专业或行会。二者都是美国大学所带有的印记。大学教师在自身实践中确实接受了大学的新准则，无论他们作为个体是否认同这些准则。比如，一位来自综合性大学的政治学副教授这样叙述他和所在大学对于教师生产力的看法：

“富有生产力，对于我而言，就是做研究……你的产品，即发表论文，就是人们所关心的。我也关心这个，这吸引着我……正是研究和发表，使我成为了一个高产的教师。”

在研究型大学，一位物理学教授陈述了他自己与大学对于生产力的不同看法，但是他能够顺应学校的要求：

“大学对于教师生产力的衡量是你发表了多少文章，受邀了多少讲座，带来了多少经费。但我认为重要的是你在自己的领域前沿做了些什么样的研究。这对我来说是重要的。……因此，我变得非常高效，完成一些事情对我来说无须花费太多时间，我可以很快地写作，很快地准备讲座。我开始非常高效，我开始明白哪些事情必须完成，哪些事情可以暂且放任。”

这种“适应规则”使得教师接受了组织的期望，但这并不包括教师接受其他不必要的规则，抑或假设自己能够通过顺从一切而从中受益的其他内化行为。

2. 顺从

顺从同样是一种适应性的策略，来应对大学的期望和这种管理体制的需求。这种顺从也是一种形式的“赌博”，一定程度上教师放弃了自己工

作中的自治权以换取所谓的“特权”。事实上，教师们也会表达出对这种剥夺教师自治权的控制系统的厌恶，但无论如何，他们参与其中了，有些甚至是乐意的。也有教师保留着他们对大学强加于教师身上犹如“生产工人”般身份的愤怒和猜疑。一名研究型大学的社会学助理教授遵守着学校的期待，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获得终身教职。她的这种顺从必须与院系的价值取向保持一致，但她恰恰不认同院系的做法。她所在的院系并没有研究上的合作，而她自身的科研需要与不同的学者们合作，包括有色人种的教师和女性教师。虽然她顺从着院系和学校对于教师生产力的标准，比如在同行评议的期刊上发表文章、争取科研基金，但她同时意识到自己和院系同事在认识论、个人价值取向上的“巨大差异”。她的这种顺从行为，某些程度上是因为她努力要获取终身教职，也是由于她和同事们在同行评议和学者声誉的重要性上秉承着相似的价值观。另一位来自研究型大学的心理学教授，他认可所在学院的工作并接受院系和学校的各种规范，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这样对于学院办学成绩的计量很清楚，这就为学院带来了办学经费，科研项目也为教师带来了暑期工资收入”。与此同时，他也表明了自己在其间的顺从。他认为学术职业的真正价值在于科研当中的自由：“是谁为研究设置议题？是教师。我们有这种自由权。”但与他自由的宣称相矛盾的是，他也承认，“做那些没有资金回报的研究，是不明智的”。这就是说，教师还是被科研项目是否有“回报性”所驱使。这两位社会学和心理学的教授都遵守着制度上的要求和期待，但是对于个人的论据而言，这些制度上的要求并不是他们自己内在的信仰。

3. 怀旧以及“类似怀旧”

如今高校的管理是为了提升教学科研的产出，提升决策和治理以使得大学更加企业化、更加高效。对这些新秩序的抵制，并不是幻想过去的大学比今天的大学更优越。认为传统和过往比现状更可取，这种支持言论就是一种形式的“怀旧”。学术上的怀旧，是一种对内化的核心价值观的表达、一种应对策略、一种学者社团道德秩序的延展。尽管学者们适应着新的组织结构和秩序，但他们仍然保留着自己领域内以及组织的传统，比如大学内在的逻辑。通过怀旧之情的表达，他们传递着这些重要的，并依旧塑造他们学术身

份的价值观：学术自治、学术自由、学者社区、共治、自我管理、知识的追求与传播以及公共服务。尽管如此，他们所在的组织已经丧失了，或者说正在丧失着这些价值观。

在一所研究型大学一位化学教授的例子中，他前后在不同的高校工作，使得他能够将如今的处境与过去相比较。他目前的工作并没有获得类似以往的成就感，他认为之前工作的两所高校提供了更多的支持，工作环境更有益于取得研究上的成就：

“在我来到这所学校之前，我所有科研上的努力，仅仅就我的合作者数量、得以发表文章的数量之类，都是我所拥有的一小部分。这些并不容易达到。毫无疑问地，我不喜欢现在这样。我每年提交30个以上的项目申请，每一次收到一个‘没通过’的回复都会让人很沮丧。因为获得项目资金是让马达正常运转的燃料。我从未想过自己会面对这一切。我也没想到这会如此困难。当然这也可能是我自己的错，我误判了这里新的环境……你并不是总可以顺利地从一个环境转移到另一个环境中。”

在这个案例中，新的高校没有办法与这位教师之前工作的高校相比，他得出这种结论就是由于自己的成就比之前有所下降。

4. 伪装

由于大学对他们的表现有所期待，终身制教师便“制造”出一些信号。他们为了满足院校的期待，展示出相应的举动，为学校创收，使得自己在组织内的位置得以稳固乃至提升。这些行为可能为他们带来金钱上的利益、组织上的认同（作为团队成员以及作为生产者），以及来自管理者的赞赏和偏爱（例如在决策中成为有影响力的角色，如同副院长之类的角色能够为自己带来经费补偿）。这种“伪装”表明的是对创收这类新的大学价值观一种顺从的态度、屈服的状态。与此同时，也表明了对这些价值观的一种抵制：教师们可以，也的确是在“伪装”，他们抱着游戏心态或者在不接受这些价值时假装“默认”，实践着一种“双重生活”。这种“魔术师”般的角色和自我展示保护教师们免受学术身份的转变：他们“愚弄着”这个系统和这些监管者、评价者，同时实践着自己认为真实、有价值的工作。当然，他们无法完全逃离一切“共谋”的行为。所以说，“伪装，既是一种抵抗，也是一种投降”^[14]。

下面举一位来自研究型大学的语言学教授的案例。该校要求教师们尽可能使博士研究生们尽快毕业，这样学校既可以量化博士生的产出，也可以形成培养规范。这名教授一边适应着学校这种期望，表面上赞成着这项政策，推动那些达标的博士生尽快毕业；另一边也策略性地保留那些仍需要更多时间的博士生。

“现在你有了产品。我们计算产品的数量而不是在评估思考的价值和这类学术工作的重要性。在现代世界中管理者中间似乎有一种信仰，即认为数量似乎比质量评定更为可信。所有的事情早晚都会沦落成一堆数字。在这堆你创造的产品数中，有一部分产品是博士学位的获得者……对此我持‘表面上的赞成’，我尝试加快一些学生毕业的速度。但是，我根本不认为那些管理上的重点就理所应当成为我们工作中的重点。如果有学生希望尽早毕业，我会支持他。但如果说‘你再多给他半年或一年，他会做得更好’，那我们何不多给他这些时间呢？我们把学生推出门外，并不会为我们赢得任何奖励。”

为了同时服务于机构和自己的内心，这位教师成为两个“主人”的“奴仆”——一是新自由主义的管理体制；二是自己的学术职业。他的伪装是一种为了保护自己学术职业道德的行为。

5. 牺牲

如果不抵制的话，对于新自由主义和新管理主义的拒绝可能会呈现在另一种形式之中，即将自身视为“受害者”。对于那些侵犯或阻碍了传统学术价值的管理行为表达出一种愤怒，是将个体置于受害者角色的一种策略，也是直面高校、院系这些代理机构的一种策略。在来自加州一所综合性大学的一位生物学副教授的案例中，可以看出大学教师成为牺牲品，因为较低的州拨款侵蚀了学术职业。

“这个工作到底提供了什么？工资可怜、工作时间长，因此又很容易造成与家人关系的紧张……我们都是为了这个州而工作。这一切并不好，是吧？但为什么我们会想从事这份工作呢？因为我们认为这将是愿意从事的工作，大学教师可能是我们可以做到很好，甚至是最好的工作了……我认为这种教师强加在自己身上的自我激励，实际上事与愿违。”

6. 抵制

忙于应对组织上的角色期待，抑或通过达

到强加给自身的学术标准来抵制负面的需求,这些策略着实使得学术职业令人精疲力尽,或许,他们并不知道如何去抵制。“惰性学术”(slow scholarship)^[15]就是一种值得注意的“抵制”行为。“惰性学术试图揭示一些隐藏的现象,比如教师个体和集体的挣扎、小心翼翼的工作,以及其他那些很大程度上不被承认、缺少回报,尤其当你是临时教师时被忽视、被贬低的工作。因此,惰性学术预期的结果,并非是再强化学术等级制度,而是要重新塑造大学,使之能够支持每个教师教学、研究、写作以及投身到不同形式的学术社区活动之中,投入足够的时间与研究伙伴对话而激发想法。”^[16]

之前提到的一位加州大学的人类学教授,在这里也是很明显的“抵制”的例子。她逃避负面的工作环境。她抵制的方式是暗示离开高校,或者创建积极的工作环境。

“在工作场所中拥有一个积极的文化是相当重要的。如果处于负面的环境之中,意识到这一切并不值得将是世界上最困难的事情,你必须逃离出来,外面还有别的世界。我们年轻时经常意识不到还有别的机会。还有很多人,在获得终身教职之前很害怕出去寻找别的工作。但如果他们身处负面的工作环境,这一切就太可怕了,即便你获得了终身教职,那也如同死亡一般。当然你可以在工作中尝试转变这种文化,人是创造文化的……”

另外,她将大学视为“官僚机构”,认为其对社会发展、维持一个整全的生活毫无益处。

“不要让你的工作成为生活的中心,它不能是。大学就是一个官僚机构,有谁希望官僚机构是自己生活的中心?这简直太可怕、太‘法西斯’了。所以生活的中心可以是智慧和理智的追求、可以是家庭,但不能是工作……而官僚机构为了自身利益,是鲜有空间和缝隙让人们作出改变的……我庆幸我身处这样的官僚机构,它为我提供了工作,提供了稳定,但它并不能定义我这个人。”

一位来自加州公立研究型大学的社会学副教授也在思考另一个职业的可能性。他试图看清研究型大学与他个人的兴趣、情感和价值观是否一致:

“作为一名民族志学者,更难获得科研经费,因为这些项目的评选都是寻找利用实证主义和科

学模型之类的研究……‘你的假设是什么?你要证明什么?’之类……我现在当然希望有更多的基金,尤其是现在经费紧张时,指导研究生也成为一件令人担忧之事。之前并未担忧过,因为研究生可以做教学助理……现在指导研究生的责任和义务又多了一些,还要帮助他们寻找奖学金。因此,我有越来越多的担忧和压力,我很担心自己的研究生能否顺利完成学业……我是一个比较有社区意识的人,我在帮助这个社区。我每周都会去一所高中,和那里的学生见面,给他们布置作业、读他们的文章,我一直在做这些额外工作……(我的学院对此一无所知)我不太确定自己的愿景,也不太确定自己是不是要结束这些社区工作。我甚至不太确定自己是不是还会继续从事学术工作。”

他的举措实现了自己的抱负,但与研究型大学的期望相左。他关心学生的发展,不仅是学校的研究生、本科生,还关心所在社区的高中生。他意识到这些举措与学校的要求不相符合,他定义自己为一个“局外人”,甚至是“不合适的人”,也在思考寻找另一份职业的可能。他的自我反思一方面是在质疑自己选择的大学教师职业的价值;另一方面是考虑离职——一种拒绝顺从的表现。

刘:您的质性研究令人印象深刻。最后,您是否可以总结下美国高校终身制教师何以在学术逻辑和市场逻辑的冲突之间维持自己的学术身份?

Levin:在大学教师的自我形象,尤其是关于学术价值、学术工作合理化的表达中,他们依赖于大学本身的制度逻辑。也就是说,他们赞美学术自由,赞美通过研究获取真知,赞美同行评议和基于委员会、自我管理之上的治理。他们不仅召唤学术逻辑,也证明自己在学术逻辑的背景下一切行为是合法的。但是,这个逻辑在当前大学中与新自由主义、市场逻辑是并列的。在市场逻辑之中,产品和行为直接简化为数字和经济价值,个体(而非集体)就是经济价值和生产力的单位。因此,个体要为自己的处境和价值负责。

在这个背景之下,教师的学术身份通过他们优先考虑学术逻辑、消除新自由主义的力量得以维持。在教学、科研、服务这些学术工作中,新自由主义都在动摇着美国大学教师的学术身份。但是,美国大学教师的学术身份还未因此转变,

很大程度上仍維持着整全。這一點不同於澳大利亞、加拿大、荷蘭、新西蘭和英國的情況，這些國家教師學術身份的轉變歸咎於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和實踐。

或許美國高等教育機構之間的聯合，尤其是高校與市場的聯繫、與州政府之間的松散關係，可以解釋這種“美國例外論”。^[17]¹³這不同於歐洲國家和英聯邦國家，他們的政府對高等教育有着更強的控制力量。美國大學教師更大程度上是與企業相聯繫。事實上，“學術資本主義”這個概念

就是主張大學和工商業之間的市場化關係，將教師行為與經濟市場聯繫在一起。美國的學術模式尊崇教師和管理行為上的學術資本主義，強調“新自由主義化”的一些價值，尤其是經濟價值；而其他國家則是將新管理主義(new managerialism)視為新自由主義。

最後，我也感謝你的訪談。我相信這個研究也會引起中國學者的興趣，吸引更多人關注中國大學教師的學術身份問題。因為新自由主義的影響在中國高等教育中也愈發明顯。

參考文獻

- [1] Olssen M, Peters M A. Neoliberalism,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knowledge economy : from free market to knowledge capitalism[J]. Journal of Education Policy, 2005, 20(3).
- [2] Lerner W. Neoliberalism in (regional) theory and practice : the stronger communities action fund in New Zealand[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05, 43(1).
- [3] Gordon C. Governmental rationality : an introduction[M]//Foucault M, Burchell G, Gordon C, et al. The Foucault effect : studies in governmentality. Chicago, IL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 [4] Slaughter S, Leslie L. Academic capitalism : politics, policies, and the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M]. Baltimore, MD :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 [5] Walker J. Time as the fourth dimension in the glob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J]. The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2009, 80(5).
- [6] Gonzales L, Martinez E, Ordu C. Exploring faculty experiences in a striving university through the lens of academic capitalism[J]. Studies in Education, 2014, 39(17).
- [7] Giroux H A. The terror of neoliberalism : rethinking the significance of cultural politics[J]. College Literature, 2005, 32(1).
- [8] Levin J S, Aliyeva A. Embedded neoliberalism within faculty professional identity[J]. Review of Higher Education, 2015, 38(4).
- [9] Crouch C. The strange non-death of neoliberalism[M]. Malden, MA : Polity, 2011.
- [10] Levin J S, Hernandez V M. Divided identity : part-time faculty in public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J]. The Review of Higher Education, 2014, 37(4).
- [11] Burke P J, Stets J E. Identity theory[M]. 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 [12] Brennan G. What's to be explained? And is it so bad?[M]//Thornton M. Through a glass darkly : the social sciences look at the neoliberal university. Canberra :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ANU Press, 2011.
- [13] Levin S L. Full-time tenure track faculty : stability within an insecure professional identity[C]. New York : AERA, 2018.
- [14] Ball S J. The teacher's soul and the terrors of performativity[J]. Journal of Education Policy, 2003, 18(2).
- [15] Mountz A, Bonds A, Mansfield B, et al. For slow scholarship : a feminist politics of resistance through collective action in the neoliberal university[J]. ACME : An International E-Journal for Critical Geographies, 2015, 14(4).
- [16] Robertson B A. Slow scholarship as political action : the culture of speed and the challenge of inclusion within the academy[EB/OL].[2018-06-13]. <http://activehistory.ca/2016/06/slow-scholarship-as-political-action-the-culture-of-speed-and-the-challenge-of-inclusion-within-the-academy/>.
- [17] Lipset S.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 a double edged sword[M]. New York : W. W. Norton & Company, 1996.

[責任編輯 : 羅雯瑤]

The Tension and Adaptation of the Academic Identity of Tenure-track Teachers in American Universities Under Neoliberalism: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John. S. Levin

John. S. Levin¹ LIU Jun-ying²

(1.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Riverside CA 92521, US;

2. Institute of Education,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China)

Abstract : Neoliberalism has not only impacted the structures and practices of different types of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but also challenged the traditional academic identity of teachers. Against this backdrop, tenure-track faculty members of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in America attempt to rationalize their professional academic identity through different approaches: they choose normative socialization, compliance, nostalgia and quasi-nostalgia, disguise, victimization or resistance among various kinds of standards and regulations. In these ways, these faulty members preserve their academic identity by giving priority to considering academic logic and diminishing the neoliberal potency.

Key words : academic identity; tenure-track teachers; neoliberalism; higher education in America

高等教育青年学者论坛在苏州大学召开

2018年6月2日,苏州大学学报编辑部和《高等教育研究》杂志社共同主办的“新时代 新青年 新愿景——高等教育青年学者论坛”在苏州大学本部红楼会议中心召开。人大书报资料中心教育学学科执行主编谭旭、《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副社长袁康、《高等教育研究》副主编曾伟、人大书报资料中心《高等教育》编辑张磊、中国社会科学网编辑毕雁等期刊与网络媒体代表,《清华大学教育研究》主编、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叶赋桂教授,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吕林海教授,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荀渊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王晨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王建华教授等知名专家,以及来自全国各地从事高等教育研究的青年学者100余人参加了此次会议,共同研讨“一流大学的制度创新与人才培养”。本次论坛共分为五个主题,包括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模式变革、教师发展与人才流动、体制创新与域外经验和高等教育散论。经过前期对79篇参会论文的初审和筛选,共有26篇论文在会议上按主题发布,与会专家分别就论文的选题、材料选取、篇章结构、论证思路等方面展开点评。本次论坛实现学生和老师、作者和编辑、学者与学者之间的交流对话,为广大青年学者提供了展示学术风采、交流与合作的平台,推动了期刊协同发展和学术共同体建设,是《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在期刊品牌建设的发展战略下,加强与刊界、学界合作,挖掘优质稿件、凝聚优秀青年作者队伍的又一次重大创新性举措。

(苏州大学学报编辑部)